

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

一

穿过历史的 尘烟

邹赞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

穿过历史的
烟尘

邹赞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一）/邹赞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1

ISBN 978 - 7 - 5668 - 1730 - 3

I. ①穿… II. ①邹…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20323 号

.....

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一）

著 者：邹 赞

出 版 人：徐义雄

责任编辑：曹 军

责任校对：周海燕 姚苻妹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8620）85221601

营销部（8620）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邮购）

传 真：（8620）85221583（办公室） 85223774（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405 千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

定 价：4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第 55 批面上基金一等资助 (2014M550519)

中国博士后第八批特别资助 (2015T81072)

教育部 2010 年度青年基金项目 (10YJCZH255)



金茂芳与拖拉机培训班同学合影



生产劳动 (杨新三供图)



劳动场景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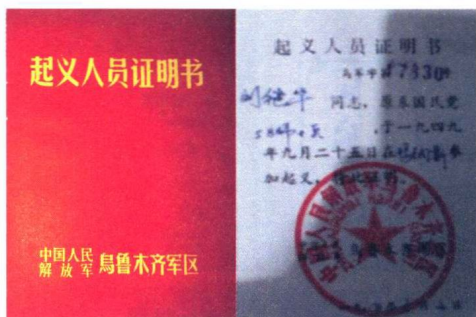
军垦战士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供图)



抬抬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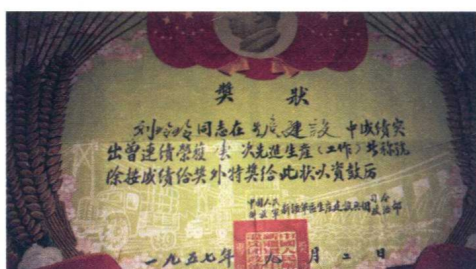
修建厂房



刘继华的“九·二五”起义证书



“八千湘女”合影（郑佩兰供图）



刘玲玲荣誉证书



刘玲玲八一农学院毕业证书



军垦女战士参加运动



沙漠剿匪（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供图）



胡友才纪录片拍摄现场



黄明德口述



王兴富口述



刘文卿口述



金茂芳近照



武来银口述



边塞新乐章



军垦第一犁



地窝子遗址



地窝子遗址



军垦第一连



小拐兵团办公旧址（陶先运供图）

序 言

汪晖 |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卢卡·帕西奥利奖获得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屯垦戍边组织，它集党、政、军、企为一体，从主要以农场及牧业为中心的政治、军事、生产组织，发展为囊括城市、科技文教、工业、贸易、农业、牧业等多种形态的政治、军事、经济组织；它镶嵌于天山南北，是新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构成了一种区别于新疆其他城乡社会的独特社会形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续了中国历史上屯垦戍边的历史传统，但并非这一传统的简单延伸，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诞生的新型社会组织。

自秦汉以来，历朝统治者为了有效应对西北边患，都曾以各种形式在西域开展屯垦戍边，但是直到清代的左宗棠，这些屯戍实践基本上都是“一代而终”，中国古代的西域屯垦并未形成一种可持续的、高度成熟的社会组织形态。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屯垦戍边事业顺应解放初期的特定社会政治形势，开启了中国屯垦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屯垦戍边”由“一代而终”变为“世代屯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内部特殊建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伴随新中国的诞生而诞生的，其使命也伴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在国家推进“向西开放”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和动议的过程中，新疆进一步成为中亚地区政治经济交流和跨文化对话的核心场域，其战略地位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新疆是一个族群众多、文化多样的跨体系社会，又有着广阔而复杂的外部环境，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面临着来自境内外的文化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严峻威胁。从这一意义上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履行着越来越重要的“固边稳疆”政治使命，它能否成为确保西北边疆政治安定的稳定器、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保障民族团结的社会纽带，关乎新疆的全局和中国

的未来。新疆兵团屯垦文化是新疆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综合体中的独特因子，因此，如何有效接合新疆当代屯垦戍边事业的历史变迁与新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充分考量新疆当代屯垦事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而探讨新形势下兵团人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新疆大学邹赞副教授综合发挥他在“文化研究”与“公众史学”领域的知识积累，历时数年辗转天山南北，完成了这部厚重的口述史著作。作为“口述兵团”系列的第一部，《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一）》通过大量访谈，再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艰辛而壮阔的发展历程，为我们理解新中国的这一独特篇章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这本著作视野开阔，严格遵循口述史的操作规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对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发展与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从一个特殊角度为重新书写共和国的历史提供了契机。我们真诚期待这部“口述新疆”系列的后续篇章顺利问世！

写在前面

邹 赞

一般认为，冷战年代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主要呈现为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决，以及壁垒森严的意识形态区隔。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柏林墙倒塌，作为全球政治生态的冷战结构退出历史舞台，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尽管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冷战思维犹如一个巨大的幽灵，徘徊游荡在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相比而言，后“冷战”时期的全球秩序更显风云变幻：一方面，作为社会结构性因素的文化摆脱了“机械决定论”模式，不再是政治、经济的被动反映，其自主性和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彰显，文化的位置被凸显，以文化和意识形态为核心要素的软实力竞争成为各种国际政治势力激烈角逐的焦点；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交锋也常常由直接的军事对决转向意识形态渗透，谁掌握了话语权和阐释权，谁就在国际话语的跨文化场域中抢得了先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境外敌对势力加强了对中国内地的思想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颠覆，妄图以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疏离大众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准则，西方社会大肆鼓吹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对我国“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中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造成了消极影响，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基于这样的社会历史情境，西北边疆（本文所涉及的西北边疆特指“新疆”）突破了“中心/边缘”的传统文化地理格局，成为非传统安全视域下地缘政治版图的核心场域。

我国新疆毗邻中亚、蒙古、俄罗斯、印度诸邦，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明的交汇之地。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向西开放”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新疆进一步成为热点受惠地区，也日益遭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觊觎。文化霸权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不断影响该地区社会与经济的稳步发展，边疆政治

安定和文化安全成为我国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前沿阵地。面对新机遇和新情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在履行“固边稳疆”的政治使命中，作用不减反增。兵团在延续中国历代屯垦戍边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包容性、开放性、政治性”为显著特征的国家内部移民文化形态。一方面，兵团文化呈现为多民族、多宗教、跨地域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如果要消解文化冲突，建构起一种互为主体、平等对话的兵团文化认同，就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而应该在倡导“一体多元”文化格局的前提下，确立起以屯垦戍边精神为内核的主体文化，妥善处理好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主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兵团屯垦戍边文化认同是构建多民族地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力量，关系到边疆文化安全和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现存唯一集党政军企职能为一体的屯垦戍边社会组织，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建制。新疆兵团屯垦文化渊源于汉唐以来的西域屯田文化，有着绵延久远的历史印记。据史料记载，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屯田最早始于汉文帝年间，为巩固北部边防、抵御匈奴侵扰，政治家晁错上书汉文帝，“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敌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①。晁错认识到“将士轮换”守边制度的不足，主张“募民实边”，以特赦和优惠政策从内地招募罪人、刑满免罪者、家奴、官奴以及自愿支边的农民，“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②。这种重视对屯民进行军事训练、鼓励他们扎根边疆的理念显现出“寓兵于民、屯田戍边”的农战思想。到了汉宣帝年间，军事家赵充国三次呈献屯田良策，“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③赵充国所上奏疏的高明之处在于阐明了解决边疆地区民族矛盾的新思路，即要恩威并举，军事镇压和屯田戍边双管齐下。值得注意的是，赵充国历陈在边疆多民族地

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编：《中国历代屯垦资料选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编：《中国历代屯垦资料选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

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编：《中国历代屯垦资料选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 页。

区兴办军屯的巨大益处，诸如“屯田得谷”、打击叛乱敌人并争取一般的少数民族群众、保护农桑、开源节流、弘扬国威等。^①如果说两汉屯田以军屯为主要形式，以巩固西北边防为政治目标；那么，曹魏的屯田之举则以民屯为主，垦荒屯田不是为了加强塞防，而是服务于“奖掖农耕、鼓励桑织”的内地发展战略。唐王朝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曾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瑰丽的精神财富，为了有效应对西北边疆突厥、吐蕃侵袭，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在天山南北大兴屯垦，促进了西域屯垦的大发展和历史进步”^②。唐王朝吸取了“屯田兴，边境宁；屯田废，边境乱”的历史教训，凭借中央政府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采取军屯和民屯相结合的形式，除了边防戍卒，还从内地大量招募破产农民以及流放西域的犯人。^③北宋时期多边患，辽和西夏虎视眈眈，时常劫掠边民，虽然有陈恕、钱若水、范仲淹等有识之士秉笔谏言、呈献屯田戍边之策，但终因朝廷腐败，无暇顾及边防屯戍而导致朝政覆灭。明代屯田兴盛，且形式多样，有民屯、谪屯、商屯、军屯诸种^④。为了确保长久戍边，明代统治者还挖空心思安抚士兵，强化士兵与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总是让军士在营，带家小随往，使之有‘系累’或‘系绊’”^⑤。清代是我国历代屯垦事业发展相当成熟的时期，中央王朝审时度势，认识到要抵御沙俄入侵、平定准噶尔叛乱，就必须在西北边疆大兴屯垦。除了沿袭汉唐以来的军屯模式外，清朝还特别重视发展民屯，“清代民屯的蓬勃发展，是清代新疆较之前代的重要战略转变，改变了汉唐以来新疆屯垦专为养兵的局面，从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发”^⑥。1875年，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围绕“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展开了激烈论争，这一方面反映出晚清政府陷入遭受列强觊觎的险恶政治局势，另一方面也再度印证了屯田戍边对于固边稳疆、定国安邦的重要意义。民国年间，我国西北边陲政权更替频繁，局势动荡，这一时期的新疆屯垦“两起两落，有过兴盛，也经历了衰退。屯垦事业艰难、曲折地发展着”^⑦。

① 详论可参见李福生主编：《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上卷），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② 张安福、郭宁等著：《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③ 张安福、郭宁等著：《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2页。

④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⑤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5页。

⑥ 张安福：《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

⑦ 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坦诚争取和积极斡旋下，陶峙岳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伴随着新疆融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潮流，新疆屯垦事业也迎来新的机遇。应当说，当代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实践凝聚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屯垦思想智慧，科学吸收了历代屯垦经验和农战思想，是维护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王震率领的进疆部队会同国民党“九·二五”起义官兵，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开展大生产运动和部队整编工作，“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和人民的生活，稳定了新疆的局势，而且把那些复员转业回乡的内地军人，暂缓复员，留在新疆作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骨干力量，为新疆兵团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告成立，十余万官兵就地转业，劳武结合、屯垦戍边，建成了一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永不转业”的生产队、战斗队和工作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兵团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业绩，迎来了当代屯垦戍边事业的黄金时代。兵团犹如一个大熔炉，融汇了解放军进疆部队、国民党部队起义官兵、西上天山的内地女兵、知识分子、支边青年、流民遣犯以及自流来疆人员，也凝集了新疆世居民族和内地来疆的各族群众，成为多元文化交流对话的典型场域。尽管新疆兵团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重大挫折，甚至曾经一度被撤销，但自从80年代初恢复建制以来，新疆兵团一直都是巩固西北边防、维护民族团结的前沿阵地，其所承担的政治使命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愈显重要。

新疆兵团屯垦戍边继承了汉唐以来的西域屯田历史实践，虽然二者在屯垦目的、屯垦主体、组织形式乃至屯垦绩效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说，历代屯垦实践对于当代屯垦戍边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屯垦戍边有利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确保丝绸之路畅通，加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与内地汉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草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中亚文明与东亚文明之间的互通有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其次，屯垦戍边所带来的大规模、有组织的人口流动有利于增进民族融合，更新生产方式，进而强化国家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意识。费孝通先生详细爬梳中华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源流谱系，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说法，“在这多元格局中，同时也在接触中出现了竞争机制，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

^① 李福生主编：《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上卷），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原有的个性”^①。所谓“多元一体格局”，既指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在历史进程中的渗透融合，也意味着区域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比如楚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与西域文化间的对话。可以说，能否正确认识到中华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关系到当下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基础。再次，屯垦戍边不仅加强了人口迁移、经济交流，也极大地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文化发展。这种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互影响，广泛涉及宗教、文学创作、音乐歌舞、日常审美等。盛唐时的“文人出塞”热潮催生了以王之涣、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唐玄奘不畏艰难远赴西天取经，留下了广有影响的《大唐西域记》。佛经在中原的传播，影响了变文、俗讲等文学样式。西域歌舞、宗教绘画也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跨异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触及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由于民族融合给文人心理带来的巨大变化，从唐代开始，边塞诗人的心弦开始鸣奏出一种强音，即不再把边塞视为异域，把它和故乡对立起来，而是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边塞，甚至以那里为自己的归宿”^②。

综而论之，新疆兵团屯垦文化渊源于汉唐以来的西域屯田文化，这种文化在长久的传承和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以内地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为母体，以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根本宗旨，以前仆后继的屯垦军民为主要载体，吸收了新疆多民族文化以及内地移民文化，兼具爱国主义精神、开拓进取意识和多元共生态势。^③

二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织形态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发生变化。在50—70年代，兵团基本上是一个“劳武结合”的准军事化组织。“文革”之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历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文革”十年，兵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遭遇重大损失，并于1975年被撤销。1981年，党中央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建制。20世纪80年代，新疆兵团屯垦事业穿越历史

①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② 张安福、郭宁等著：《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③ 有关新疆兵团文化的特征，可参见高静文、张春霞：《兵团文化的特征及其当代价值》，载《新疆社科论坛》2010年第4期；王小平、安晓平：《论新疆屯垦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新疆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载《塔里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的雾障，重新与兵团初创时期相串接，以军垦第一代为核心力量、以内地新移民为新鲜血液的屯垦文化获得了长足进展。在文学创作方面，以杨牧、周涛、章得益为代表的“新边塞诗”登上中国文坛，其中杨牧的诗歌《我是青年》和自传体小说《天狼星下》影响较大。西部第一家诗刊《绿风》也在“戈壁明珠”石河子安营扎寨，推出了著名诗人石河、杨眉、杨树、高炯浩等。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文化延续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内核，突显了理想主义和多元文化色彩。

20世纪90年代以降，市场化改革对兵团的高度计划经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兵团人口主体构成的巨大变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兵团基层组织日趋松散，年青一代和新移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迷惘与动摇，屯垦戍边文化认同遭遇“代际断层”。

首先，兵团政企不分的计划管理模式极大地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兵团经济不仅落后于内地许多省市，某些团场的经济发展状况甚至不及新疆一些地方州县，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观念相对滞后，兵团逐渐丧失了五六十年代的吸引力。

其次，兵团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有组织的大规模内部移民使得兵团人口快速增长，70年代中后期，兵团被撤销建制，原本隶属兵团管辖的人员大量转移到地方。80年代初兵团恢复建制，人口格局相对稳定。90年代以来，兵团迎来了第二波移民潮，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投资、农业现代化等领域提供大量优惠政策，兵团的区域优势崭露头角；另一方面，随着军垦第一代^①退休（有的选择回内地或者南北疆各城镇居住）、部分军垦第二代选择定居城市或者改行经商，军垦第三代远赴内地求学谋职等，兵团劳动力供给严重匮乏。有数据显示，“兵团职工人数由1991年的101万人持续减少到2005年的66.54万人，十几年内兵团职工总人数减少了近一半。而从1990年到2005年兵团农场总播种面积从780.8千公顷增加到985.8千公顷。其中需要大量拾花劳动力的棉花播种面积从170千公顷增加

^① 本书对于军垦代际的划分，采取学界通行的模糊划分法，即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疆的这一批为“军垦第一代”，以这一时段出生并且在兵团长大、留在兵团服务的为“军垦第二代”，80年代后出生的军垦后代基本上划归为“军垦第三代”。但“军垦第三代”的命名本身很有问题，“军垦新生代”的提法可能更加合理。此外，笔者近两年来辗转天山南北寻访军垦第一代，通过对数十位老军垦的访谈，发现“军垦第三代”对屯垦戍边的历史产生了很深的隔膜，他们甚至不愿意了解或者不相信爷爷奶奶这一辈的艰苦创业事迹。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为了与学界通行的说法保持一致，绝大部分使用“屯垦”一词，其实新疆兵团的当代屯垦事业更适合使用“军垦”的说法。

到 471.74 千公顷，种植面积在不断增大而劳动力却持续地在减少”^①。因此，为了补充劳动力的巨大缺口、确保屯垦戍边事业持续发展，兵团再度从内地引进大量新移民。但是与五六十年代相比，“进入 90 年代以来新引进的劳工大多来自贫穷、边远、人多地少的地区，文盲和半文盲人数占较大的比例，综合素质偏低”^②。与此同时，兵团还大量从内地招募拾棉花的短期季节工，每年九月，一列列满载拾棉工的列车西出阳关，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③应当说，90 年代以来的内地新移民为兵团经济建设注入了新鲜活力，但他们主要以盈利为目标，流动性很大，对屯垦戍边的历史疏于了解，很难形成自觉的屯垦戍边文化认同。

最后，随着兵团农场小城镇建设和互联网的普及，加之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兴起的时代大背景，新疆兵团文化要想重塑影响力、适应新媒介的传播方式，就必须进行文化形态的更替。一方面，“军垦第三代”身处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语境下，耳濡目染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以身体快感、时尚狂欢、娱乐至死为特征的当下流行文化消解深度模式，离析瓦解传统价值观念，质疑宏大叙事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样一来，“军垦第一代”铸剑为犁、“献了青春献子女”的伟大奉献精神在“军垦第三代”看来只是一种“神话”，一种远离现实情境的道德说教。与此同时，单纯依靠精英文化（比如屯垦文学）传播屯垦戍边精神的模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以影视为主导形式的大众文化成为弘扬兵团精神、建构新形势下屯垦戍边文化认同的理想载体。近年来，《热血兵团》《戈壁母亲》《走天山的女人》《烈日炎炎》等屯垦题材影视剧形成集群效应，备受瞩目。屯垦题材成为影视剧挖掘的富矿，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充分把握时机，以大众文化的叙事模式、借助电影电视的传播媒介，将屯垦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其中，如何有效接合（articulate）消费主义的历史情境、兵团的红色文化内核以及受众的期待视野，成功地实现屯垦文化的现代转型，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与兵团高度计划管理体制形成了急剧的张

① 刘月兰、汪学华：《1954—2005 年新疆兵团人口发展特点及制约因素分析》，载《西北人口》2008 年第 1 期，第 100 页。

② 刘月兰、汪学华：《1954—2005 年新疆兵团人口发展特点及制约因素分析》，载《西北人口》2008 年第 1 期，第 101 页。

③ 近年来，新疆兵团农场积极推广机械采棉，对内地季节性摘棉工的需求大幅减少。